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罗威廉 著 鲁西奇 罗杜芳 译 马 钊 萧致治 审校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美】罗威廉 著 鲁西奇 罗杜芳 译 马 钊 萧致治 审校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1796—1895)/

[美] 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09071-9

I. 汉…

II. ①罗…②鲁…③罗…

III. 城市史—武汉市—1796—1895

IV. 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025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 (1796—1895)

[美] 罗威廉 (William T. Rowe) 著

鲁西奇 罗杜芳 译

马 钊 萧致治 审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 开本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15.375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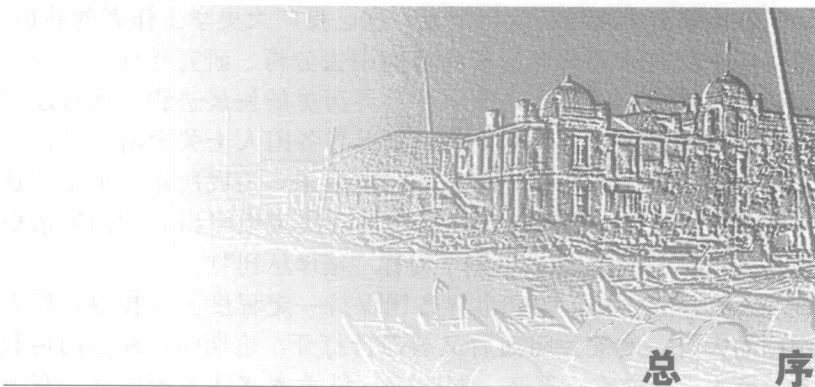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38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 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1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曾和世界各国保持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而来，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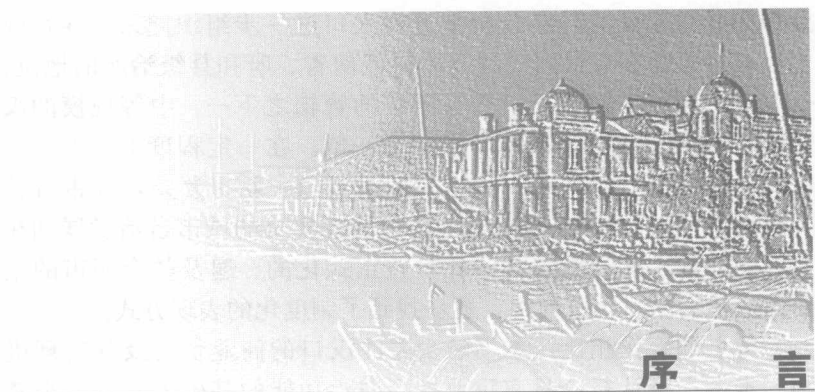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

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 年 5 月



序 言

本书是我开始于《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斯坦福：1984）的、关于 19 世纪汉口社会历史综合性研究的第二部分。撰写多卷本著述肯定会引发许多具体问题，尤其不可避免的是重复问题。本书总的原则是，尽可能避免在上部著作中已做过的描述与讨论——即使没有大段重复，两书篇幅也已经很长了。虽然大多数中国史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熟知我们的城市（指西方城市——译者）及其特点，但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乃是试图与研究西方早期现代中的城市化与社会的历史学家开展对话。因此，为了读者的方便，在此简要概括一下我此前研究的结论，也许是必要的。

汉口是长江的一个港口，其位置接近中国内地的地理中心，处在许多贯穿全国的主要长途运输线的交叉点上。这使它成为大清帝国国内区域间贸易中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我已经证明此种贸易的规模远比通常所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些因素在汉口城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口的人口，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超过 100 万；其来源非常庞杂，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非常遥远的异地他乡。数以百计的、依照籍贯和行

业原则建立起来的行会公所将这些人口进一步组织起来。在行政上，汉口没有在清帝国体制下取得任何省、府和县级治所的地位；作为一个商业市镇，它隶于汉阳县的管辖之下——中等规模的汉阳县县城位于不易渡过的汉江的另一侧。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官僚统治薄弱，虽然汉口一地人口流动频繁，籍贯复杂，并带有狭隘的乡土意识，但在19世纪，汉口将事实上的城市自治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这种城市自治在日益正式化的、遍及整个城市的主要商业行会的联合过程中，逐步找到了制度化的表现方式。

与上部著作相比，本书较少关注汉口的商业贸易及其管理机制。本书在承认行会具有重要社会政治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它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另一些正式与非正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上部著作考察的焦点是商业精英的世界，本书则拓展了视野，具体分析城市劳动阶级的所思所想及其行为。最为重要的是，本书尝试着去理解社会冲突的结构与进程，以及作为一个自发的、内聚性的社会单元的城市，是如何维持其自身并不断发展的。

在撰写两卷本著作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保持研究的连贯性。在两本书的撰写之间，新的原始材料不断发现，学术论文阅读面也逐渐扩大，必然会引导某些观点发生一些细微或不那么细微的变化。本书关注的焦点和研究重点与上部著作都有很大不同，但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我的观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首先，在上部著作中，我把研究的下限定在意义深远的地方工业化开始之时，可是现在，我认为地方工业化开始的时间不是在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并着手“自强运动”的1889年至1890年，而应是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时。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分期上的差别，但在本书的研究中却允许我们去分析许多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前期的汉口社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在本质上与其说是工业化进程的副产品，毋宁说是此前数十年间发展趋势的延续。

其次，在本书的讨论中，与我上部著作中强调汉口与本地区

域社会的联系程度不高的观点不同，本书事实上更注意讨论汉口与其紧邻腹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当然，这仅仅是程度上而不是类别上的差异。我仍然坚持认为，与大多数中国城市相比，汉口与其周围乡村的联系明显地要弱得多（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面向全国范围内的贸易），可是比之于 19 世纪前半期，这种联系在本世纪后半期有所加强；就整个 19 世纪而言，这种联系都没有随后而至的工业化时期密切——那时，汉口开始系统地从它的腹地攫取工业原材料、工厂工人和技术精英。

本书编入了以前发表的两篇论文的材料，当然在新获证据的基础上对这些论文做了重要修订。第八章关于“保甲”的部分是在我呈给《转变的中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79。由傅佛果 [Joshua A. Fogel] 和我主编的韦慕庭 [C. Martin Wilbur] 教授的退休纪念论文集）的一篇论文的基础上改写的。我非常感谢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允许我在这里重新使用这些材料。本书第九章是对我的另一篇论文《晚清城市中的叛乱及其敌人：1883 年汉口的叛乱阴谋》作了重要改写而成的，该文发表于邹说主编的《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集》第 4 辑（1979—1980）。我非常感谢在此之前国家人文科学基金和芝加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项目基金给予的资助，使我能够开始关于 1883 年事件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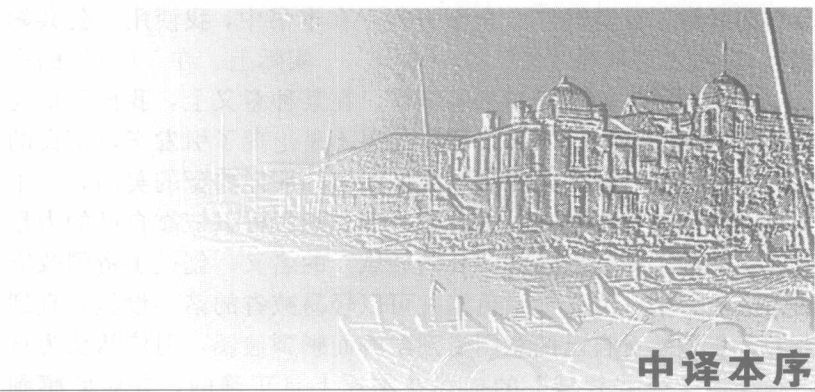
这里，我不再重复在上部著作中已经谈过的有关汉口研究的个人认识，尽管两本书起源于相同的早期研究工作，并且这些认识仍然在起作用。我必须再一次对几位朋友、老师和长期合作研究的同事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黎安友（Andy Nathan）、傅佛果、苏云峰、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萧致治和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以及我在上部著作中不慎遗漏的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海伦·塔特（Helen Tartar）。这项基础研究和以前一样，得到了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和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

我满怀敬意地对许多学者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他们尚未公开发表（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而表示感谢。他们的名字在本书注

释中均一一注明了。这里，我想特别感谢玛丽·兰金（Mary Backus Rankin）和戴维·斯特兰德（David Strand），每一个熟悉他们主要著作的读者都会在我的观点中发现他们对我的明显影响。在霍普金斯大学，我非常感激给予我支持的连续三任历史系主任——马克·沃克（Mack Walker）、奥瑞斯特·兰姆（Orest Ranum）、约翰·鲁塞尔伍德（John Russell-Wood），以及贝蒂·威尔汀（Betty Whildin）和她优秀的职员们。以下几位阅读了全部或部分原稿并提出了有价值的评论意见：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理查德·戈德史沃特（Richard Goldthwaite）、康无为（Harold Kahn）、林恩·霍伦·利斯（Lynn Hollen Lees）、韩书瑞（Susan Naquin）、玛丽·兰金、戴维·斯特兰德和马克·沃克。当然，我并不是总能正确地认识到这些忠告是最好的。

最后，与上部著作一样，我将最深厚的感激留给我的妻子，J. A. 弗里德曼（Jill A. Friedman），感谢她专业的帮助和长期以来矢志不渝的鼓励与支持。在本书旷日持久的写作过程中，她和我的两个可爱的孩子自始至终都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谨以此书献给他们。

罗威廉（William T. Rowe）



本书英文本出版于1989年，是我有关长江港口城市汉口研究的第二部著作。这一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那时，有关19世纪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英文著作十分罕见，而且很多人认为现存资料远不足以对这一论题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如今，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大量有关其他城市的研究著作纷至沓来。

这一具体实证的著作之所以引起非议，是因为它讨论了城市中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我使用这一概念，是受到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现代早期欧洲的研究以及玛丽·兰金、戴维·斯特兰德、肖邦齐（Keith Schoppa）等美国学者有关中国研究的影响。“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类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清代或民国时期的问题，已成为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定程度上，在中国也是如此。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学术泰斗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对玛丽·兰金、戴维·斯特兰德，特别是我本人将这些概念运用于有关他所认定的独裁专制王朝的研究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想，魏斐德以及其他批评我的学者，对“市民社会”作出的解释，比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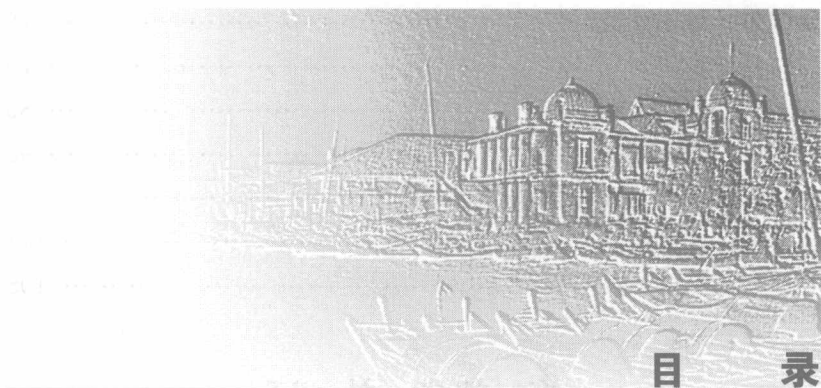
自己的理解，要更宽广、全面一些；在本书中，我使用“公共领域”，只是为了阐释“公”这一范畴——实际上，在19世纪的史料中，这一语汇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在某种意义上，我试图由此再从根本上向前迈进一步，即：如果不是出现了引发辛亥革命的适当条件，很难想象，像魏斐德所假设的那样典型的美国式民主会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实际上，地方社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许多事情，他们以地方“公共领域”的名义，创设了帝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或者只是负担并可以轻易减省的诸多设施。直到今天，我虽然对自己的意图受到误解而感到遗憾，但依然认为自己汉口“公共领域”的描述在本质上是正确的，并对此感到满意。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看，本书有两个方面，我可能会进行不同处理。首先，我会更注意讨论19世纪汉口社会的性别，或者妇女的经历。本书出版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会安慰自己说：有关材料太过简略，不足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想问题也许并不仅仅在于我不知道何处有系统叙述汉口妇女的材料。其次，我会更密切地关注汉口日常生活中暴力的存在。当然，本书对暴力冲突已作了大量探讨，但最主要的侧重点放在如何抑制或解决暴力冲突方面。考虑到已有的阐释模式均认为19世纪的中国城市是混乱的、难以管理的，我认为有必要着重强调城市居民是如何通过社区（community），以集体的力量去控制暴力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样做是重要的，只是我想我会花费更多的精力，试图去理解暴力活动产生的根源，以及司空见惯的暴力对城市居民生活的影响。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曾有机会于1981年在武汉度过了约半年时间。我永远不会忘怀那些日月。如今，中国已经没有那样的城市。1981年，“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几年，集体化强制和计划经济的束缚虽已开始松动（对于汉口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以商业为其存在基础的城市来说，关闭私营市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今日中国城市特有的狂热商业化尚未发端。社会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年来，我又有机会几次重返武汉，对它的发展

与繁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知道，武汉居民的总体生活状况较之 1981 年已有了极大改善。实际上，虽然拥有“现代”新面貌，而商业经济繁荣的今日武汉，也许与 19 世纪作为中国最繁华河港城市的汉口更为相似。可是，我却情不自禁地更怀念我所熟悉的 1981 年那个静谧的城市。

2006 年 3 月，于巴尔的摩



绪论：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城市	1
---------------------	---

第一部分 城 市

第1章 市民	17
一、城市心态和文化	19
二、传媒与政治生活	26
三、职业结构	35
四、生产组织	46
五、城市化移民	54
六、阶级	61
七、精英和社团意识	69
八、结语	76

第2章 城市空间	78
一、地产	79
二、空间结构	86
三、土地配置	90
四、居住方式和街区结构	94
五、活动中心	101
六、结语	105

第二部分 社 区

第3章 大众福利	109
一、国家主导：救灾	110
二、国家主导：仓储	113
三、国家与社会共同主导：公益机构	119
四、社会主导：善堂体系	126
五、常规化的大众福利：粥厂与“冬防”	153
六、结语：城市社区的制度化	156
第4章 公共设施与公用事业	162
一、城市建设	164
二、防洪	174
三、防火与消防	189
四、公用事业	202
五、文化机构	208
六、结语：公共领域的兴起	220

第三部分 冲 突

第 5 章 冲突的结构	227
一、犯罪和社会病态	228
二、群体纠纷	239
三、礼仪之争：龙舟赛	243
四、民众抗议	249
五、结语：冲突与社会整合	259
第 6 章 危险阶级与劳动阶级	261
一、地痞	262
二、退伍乡勇	267
三、难民和流浪汉	273
四、劳工帮伙	280
五、结语：19 世纪汉口的“危险阶级”	294
第 7 章 忠实的信徒	297
一、造反者	298
二、民间秘密教派和会党	312
三、排外主义	329
四、结语：市民与外来者	338

第四部分 控 制

第 8 章 控制力量	343
一、驻防清军	344

二、自卫：城市团勇和汉口城墙	349
三、保甲	358
四、1876—1883 年间内部安全之强化	369
五、结语：没有警察的治安	376
 第 9 章 危机与应对	 380
一、反叛者、动因和时机	383
二、密谋	391
三、参与者的地域来源及城市在危急时刻的反应	397
四、反叛乱动员的机制	401
五、总结和余论	408
 结 语	 413
主要参考文献	423
译后记	473